

荆州博物馆 编

荆楚文物

第1辑



科学出版社

荆楚文物

第 1 辑

荆州博物馆 编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荆楚文物》是荆州博物馆编著的关于荆楚地区（即江汉平原及其周边区域）考古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集资料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系列学术文集。

本书为此丛书第1辑，收录了24篇研究论文和3篇考古发掘简报。研究论文涉及荆楚地区史前和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楚文化文物研究、南方大遗址保护与展示、出土饱水文物保护技术、古建筑维修技术与理念、博物馆与观众、考古绘图新方法等方面的内容。简报公布了荆州博物馆近年发掘的印台汉墓、板栗林唐墓、汪家台宋墓的考古资料。

本书适合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人类学和文物保护技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荆楚文物. 第1辑 / 荆州博物馆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0

ISBN 978-7-03-038817-9

I. ①荆… II. ①荆… III. ①文物工作—荆州市—丛刊 IV. ①K872.63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9543号

责任编辑：王光明 / 责任校对：宣 慧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年10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1/4 插页：2

字数：400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编辑委员会

顾 问：严文明 李伯谦 高崇文 黄锡全
胡美洲 陈振裕 刘彬徽 郭德维
谭维四 滕壬生 张绪球 彭 浩

编 委：张治根 王明钦 张万高 刘德银
贾汉清 彭 昊 武家璧 杨开勇
赵晓斌 金 陵 李 红 龚英明
肖 璇
吴顺清（特邀）
方北松（特邀）
何 弩（特邀）
王 宏（特邀）
院文清（特邀）
尹弘兵（特邀）
孟修祥（特邀）

主 编：张治根

副主编：王明钦

编 辑：丁家元 李志芳 何德珍

发 刊 词

严文明

荆州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因为她有悠久的历史、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资源，还曾经是楚国极盛时期的都城所在，占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这里的地下文物不但数目巨大，而且品位极高。加以地下水位高，大量古物多在潜水面下，使许多在别的地方难以保存的有机质文物得以完好如新，为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条件。荆州博物馆就是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科学的发展下建立并不断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地市级博物馆中，荆州博物馆是特色鲜明并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荆州博物馆的陈列品绝大部分为本馆学者考古发掘所得，另一部分是与有关单位合作发掘的物品。北京大学考古系的多名老师，包括我个人在内，也曾参加了部分工作，与荆州博物馆的同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荆州博物馆的藏品和陈列品中有些是特别珍贵的。例如，1975年在凤凰山发掘的168号汉墓，墓主人是一位男性老人，尸体保存完好。据随葬遣册记载，下葬年份比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发现的软侯夫人辛追还早十几年。又如，1983年发掘的马山1号楚墓，出土了大批衣衾等丝绸织品，其做工的精致和保存的完好程度堪与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的丝绸织品比美，年代却比后者早了许多。至于大量保存完好的楚国漆器，其做工的精致和艺术的造诣都是其他地区所罕见的。还是因为保存条件好，不少楚墓和秦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简牍，著名的郭店楚简中就包含大量古书，对研究先秦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荆州博物馆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科技研究机构，在出土简牍、漆器和丝织品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和研究方面成绩卓著。不但有效地保护了本馆考古发掘的物品，还多次接受外单位的相关任务。

事业的发展总是离不开人才，而人才又往往是在事业的发展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荆州博物馆正是在事业的发展中造就了一批专业素质颇高的学者，研究领域涉及史前文化、先秦考古和秦汉考古，以及玉器、漆器、丝织品、古文字、古建筑等诸多方面。在楚文化考古和研究方面着力尤多，先后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专著和考古报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好评。为了更集中更系统地发表研究成果，馆方决定正式出版《荆楚文物》。除了发表本馆学者的研究成果，还特别热切地欢迎相关方面的学者投稿，希望大家共同来浇灌和培育这块新生的园地！

2012年5月25日于北大蓝旗营

目 录

发刊词·····	严文明 (i)
----------	-----------

一、楚文化研究

楚文化渊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谨以此文纪念楚文化研究巨擘俞伟超先生·····	高崇文 (3)
在荆州考古的回忆并论及楚季钟与早期楚文化的探索·····	刘彬徽 (12)
早期楚文化考古探索的理论思考点滴·····	何 弩 (21)
古庸、濮历史地理与早期楚文化·····	尹弘兵 (25)

二、考古学研究

丹江口市北泰山庙遗址旧石器研究·····	祝恒富 (39)
一种新石器时代木构建筑物的陶制顶刹	
——屈家岭文化出土的“陶筒形器”之用途蠡测·····	孙启康 (55)
沮漳河之东夏商周文化探讨·····	杨权喜 (65)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路家河类型简论·····	张万高 (77)
马山一号墓出土“木辟邪”考述·····	聂 菲 (89)
峡江地区西周人的经济文化形态初析·····	王从礼 (96)
楚国货币文字“圻”及有关问题再议·····	黄锡全 (112)
熊家冢出土楚式玉器的纹饰·····	张绪球 (120)
曾侯乙墓鸳鸯盒漆画“铿锵鼓舞”图·····	武家璧 (134)
湖北明代朱氏宗藩墓葬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	院文清 (145)

三、考古新发现

湖北荆州印台墓地M130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159)
荆州雨台余家山板栗林一座唐墓发掘简报·····	荆州博物馆 (166)
荆州发现北宋多人二次合葬墓·····	荆州博物馆 (172)

四、纪南城与大遗址保护

试论楚都纪南城的特点

——兼论楚人对水的重视·····	郭德维 (179)
楚墓葬文化展示刍议	
——以荆州楚墓专题博物馆展示为例·····	王红星 (192)

五、文物保护与科技研究

饱水木器超临界脱水初步试验·····	方北松 吴昊 史少华 高芳	(205)
浅谈中国古建筑保护与维修价值观·····	杨新	(210)
武当山仁威观保护原则与措施·····	吴晓	(214)

六、博物馆学研究

用真爱接待少儿观众·····	齐吉祥	(225)
东部地区生态博物馆及其理念的探索：以浙江为例·····	杨新平	(231)
志愿者讲解员的积极影响 ——湖北省博物馆2011年观众调查研究成果之二·····	万全文	(240)

七、其 他

琐论考古工作中的电脑制图技术·····	贾汉清	(249)
正旋转体器物残片标本制图的探讨·····	李天智	(257)
征稿启事·····		(268)

一、楚文化研究

楚文化渊源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谨以此文纪念楚文化研究巨擘俞伟超先生

高崇文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摘要: 目前,在陕、豫、鄂三省交界地域发现了一种“过风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从地理位置看,这一区域直接与襄宜地区相邻,从文化特征看,也与襄宜地区的楚文化紧密衔接。据此可以推测,东周时期的典型楚文化可能来源于丹江至汉水山地一带的过风楼类型的考古学文化。根据清华简《楚居》所提供的重要线索,结合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可以判断,西周时期熊绎所居丹阳是泛指丹水之阳,夷屯才是熊绎所建的楚国第一座都城。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应在襄宜平原区域内。

关键词: 楚文化 丹阳 夷屯 郢都 《楚居》

1979年5月3~29日,我陪同俞伟超先生至湖北云梦、襄樊、宜城、荆门、宜昌、当阳、枝江、秭归、江陵等地考察,一起陪同的还有陈振裕、杨权喜、王光镐等先生。回到武汉后,应湖北省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之邀,俞先生作了题为《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的学术报告^[1],从为什么要研究楚文化、楚文化发展的简单历程、考古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概况、楚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作了全面阐述。俞先生指出,“五十年代探索楚文化的中心是在湖南”,“到了六十年代,湖北省的考古工作发展起来了。江陵纪南城是楚郢都遗址,楚国在此建都达四百年之久。因此,荆州自然是探索楚文化的一个中心”。六七十年代,荆州的楚文化考古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如江陵望山、沙冢^[2]、藤店^[3]、天星观^[4]等大中型贵族墓的发掘,张家山^[5]、太晖观^[6]、葛陂寺^[7]、拍马山^[8]等小型墓的发掘,江陵雨台山集中发掘了500余座小型墓^[9]。1975年,对纪南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与发掘^[10]。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凸显了荆州地区对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性。1980年11月,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在武昌召开,会议主题以楚文化研究为重点。1981年6月,在长沙成立了主要有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四省考古工作者参加的楚文化研究会,加强了楚文化研究的交流与合作。正是由这些楚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以及所举行的学术活动,从而促成了新一轮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到来。正如俞先生所说:“七十年代对楚文化探索中心是在荆州,为了探索早期楚文化,从而寻找楚文化的渊源,到了八十年代,除了会进一步在荆州纪南城周围进行工作外,还一定会在宜昌地区的当阳、枝江一带进行工作,

寻找西周时期楚文化的面貌。”俞先生还指出：“为了搞清楚文化的来源，在江汉平原，特别是在沮漳河流域，对新石器时代晚期，特别是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及其更晚一些的遗存进行调查、发掘，就可以从上下两头来探索楚文化的来源。”俞先生为我们指出了今后楚文化研究的重点，揭开了新一轮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序幕。

一、楚文化渊源的探索

关于楚文化的渊源，这是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主要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楚文化来源于江汉平原的原始文化，一种认为来源于中原的原始文化，这些观点多是基于文献记载的楚先祖出于何地而提出来的。为了从考古学文化系统上寻找楚文化的渊源，1979年下半年，在俞先生的带领下，有湖北省博物馆、宜昌地区文物工作队、当阳县文化局等单位的同志及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部分师生参加，对当阳季家湖古城进行了试掘。这次试掘，发现了古城的南墙和城壕，在一号台基处发现了大型房屋基址和散水，在杨家山子西部发现了制陶作坊遗迹等。古城的时代要比纪南城略早，应属春秋时期^[11]。

为了进一步了解沮漳河流域的文化面貌，根据俞先生的安排，我们于1980年又对当阳、远安境内的沮漳河沿岸进行了详细的普查^[12]，发现楚文化遗址多处，并对当阳涪溪的杨木岗遗址^[13]、河溶的磨盘山遗址^[14]进行了试掘。这几处遗址有一共同点，所出陶片以红陶、红褐陶为大宗，代表性的器物有红褐陶截锥足小口鬲、褐陶卷尖唇大口鬲、红陶圜底瓮、磨光黑陶折腹豆、磨光黑陶三角镂孔粗圈足豆等，从陶色和器形看，比季家湖古城所出陶器要早。这对春秋时期楚文化系统陶器特点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经过对沮漳河流域考古调查发现，沮漳流域的当阳、枝江地区出现的楚文化遗存，要比楚郢都纪南城所在的荆州地区略早，且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也比荆州地区多。但是，这些较早楚文化遗址一般堆积都不厚，给人以此种文化刚来不久的感觉。至于西周时期的典型楚文化遗存在这一区域还没有发现。

虽然在沮漳河流域没有发现西周时期的楚文化，但对季家湖古城发掘却有另外的收获，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即季家湖下层文化，相当于龙山时期。这样，江汉平原西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基本确立：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鄂西类型→季家湖文化。通过普查也发现，这三种文化遗存在沮漳河流域（包括枝江境）是非常丰富的，文化堆积也特别厚，在同一个遗址中往往有三种或两种文化层叠压。由此可以判断，沮漳河流域有可能是这三种原始文化发展的中心地区。俞先生利用季家湖文化的典型器物锥足鼎探讨了楚式鬲的形成过程，他认为：“楚文化系统特有的高腿锥足红陶楚式鬲，当是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在受到商文化影响而发生陶鬲之时，同原有的一种红陶锥足罐形鼎结合改造而成。这就揭示出了季家湖遗存同楚文化的某些直线联系，具体表现出了鄂西及三峡地区大溪至季家湖下层的文化系统是楚文化前身的可能性。”^[15]虽然此观点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毕竟是俞先生利用考古类型

学的方法，从考古学文化系统上来探索楚文化来源的新思路。按照俞先生的思路，我也分析过江汉平原夏商时期存在着两大文化系统，即以釜、釜形鼎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和以鬲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以釜、釜形鼎为代表的文化系统主要是由江汉平原原始土著文化发展来的，而以鬲为代表的文化系统则是中原文化南进的结果。楚文化与以鬲为代表的文化有关系，从而否定了楚文化来源于江汉平原的土著文化。并认为，楚文化是在江汉平原东部商文化的影响下孕育产生的^[16]。后来发现，在江汉平原已发现的不少商时期的遗址，如黄陂盘龙城^[17]、江陵荆南寺^[18]、沙市周梁玉桥^[19]等遗址，其文化面貌与确知的楚文化还有相当大的差别，显然不是一个直承发展的文化系统。

正当沮漳河流域寻找早期楚文化的工作陷入僵局时，襄樊地区早期楚文化的考古有了重大突破。80年代后期，先后发现了均县朱家台遗址^[20]、襄樊真武山遗址^[21]，这两个遗址内均出土了典型的楚式柱足陶鬲以及楚式盂等，时代为西周中期至晚期。此后又陆续发现了宜城郭家岗、桐树园、肖家岭、老河口杨营等遗址^[22]，在这些遗址中均发现了由真武山、朱家台文化系统直接发展来的典型的春秋楚文化遗存，并且面积比较大，堆积比较厚，内涵比较丰富。这些都表明，襄宜平原是春秋时期楚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域。

200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商南县丹江北岸的过风楼遗址，出土大批陶器，主要有鬲、甗、罐、瓮等，整体风格独特。2007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邀请了本研究所内专门研究周文化的专家和湖北省专门研究楚文化的专家一起到现场进行了研讨，焦南峰先生也邀请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这批遗存属于西周时期，有浓厚的周文化因素，但不是典型的周文化，属于此地域的一个与周文化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特文化类型。并且大家也注意到，其独特特征似乎显示着与江汉地区的楚文化有某些联系，如陶色以褐陶、红褐陶为主，器类中的联裆柱足鬲、直颈圆腹罐、矮直领瓮等，这些都有别于周文化而相似于楚文化。后经对过风楼类型的考古遗存进行详细梳理可以看出，西周早期，过风楼类型文化基本分布在陕鄂交界的山区地域，目前已发现的有商南县过风楼遗址、郧县辽瓦店子遗址、十堰市大东湾遗址等，都位于汉水和丹江江边台地上。至西周中晚期，过风楼类型文化沿丹江和汉水向东部扩展，进入到丹江与汉水汇合处的淅川县至丹江口市地域内，目前发现的遗址有淅川下寨遗址、下王岗遗址、龙山岗遗址、双河镇遗址、丹江口市朱家台遗址、观音坪遗址等^[23]。从地理位置看，这一区域直接与襄宜地区相邻，从文化特征看，也与襄宜地区的楚文化紧密衔接。据此可以推测，东周时期的典型楚文化可能来源于丹江至汉水山地一带的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

2010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保护中心出版了所藏战国竹简^[24]，其中《楚居》记载的楚先王居地，为我们寻找楚文化的渊源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楚居》记载，楚之先祖季连初降于騶山，抵于穴窟，出于乔山，宅处爰波，逆上洧水，处于方山。《楚居》中所记的这几处地名，在《山海经》中多有记载，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考究，有认为是指中原新密、荥阳一带之山名^[25]，有认为是指陕鄂交界之山名^[26]，有认为是指大西北甘青一带之山名^[27]，近又提出楚先祖老童所居騶山在四川西部的岷山^[28]，

意见分歧颇大。究其原因，是因为《楚居》所记的季连事迹属于神话传说，而《山海经》也掺杂了许多神话传说之内容。且古代重名的山名、地名众多，如果再加上声韵通假相同的名称，全国各地同名之山可谓不计其数了。如果以此来复原本属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时代楚之居处，只能是众说纷纭，又返回到楚源于东、南、西、北、中的纷争之中，恐怕永远得不到一致性的意见，而且会越来越“神话”了。因此，我们今天再分析这些材料，就不能还如古人那样将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而应尽可能根据当时（即《楚居》《山海经》作者所处的战国时代）实际的地理情况及历史背景，分清哪些只是神话传说，哪些是有据可考的信史，这样才能梳理出可信的线索。《中山经》所记地名多在丹水和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这一带的地理情况应是比较熟悉的，比大西北、川西高原以及中原的一些地名更具实际性，应当是战国楚人的实录^[29]。学术界对于《楚居》中“洌水”的释读意见相对比较一致，即均水，这正与《中山经》所记这一地域的山水属一个系统。另外，河南新蔡出土楚简也有记载楚先祖活动地域的内容：“昔我先出自郢道，宅兹沔（沮）漳，台（以）遷罍（遷）尻（處）。……”^[30]何琳仪先生将“郢”读作“均”，“道”释作“追”，读作“归”，“迁处”读作“迁居”，其下可补“於郢”，简文则成“昔我先出自均，追（归）宅兹沮漳，以选迁处（居）於郢。”大意谓：“过去，我的先辈出自均陵，往居此沮、漳流域，又选择迁居在郢。”何先生指出，“均陵”以均水得名，“均水”就是后代的“淅川”^[31]。《水经注·均水》载：“均水出淅县北山，南流过其县之东。”注云：“均水发源弘农郡之卢氏县熊耳山，……即淅县之北乡，故言出淅县北也。均水又东南流径其县下，南越南乡县，又南流与丹水合。”均水为丹江支流，属丹江水系。《楚居》中的“逆上洌水”印证了何琳仪先生对“郢”的释读是正确的。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楚先祖早期的活动地域应在汉水中游至丹江流域。西周时期，楚国已进入有据可考的信史时期，《楚居》所载西周至春秋时期楚先祖居地的具体地望虽还有不同的见解，但大的方位也是在汉水中游至丹江中下游一带，春秋时期迁徙到襄宜平原（详见下文）。楚先祖居地迁徙路径与过风楼类型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正好相吻合^[32]。

现在还不能说楚文化的源头已经找到，因为“过风楼类型”文化刚刚发现，其具体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演变规律等还需继续探讨。这一类型文化分布于陕、豫、鄂交汇地域，热切期望三省的同仁们为寻找楚文化的渊源作出更大的贡献，以解开这一历史之谜。

二、楚丹阳、郢都地望的探索

1975年，在江陵纪南城进行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出了西垣北边城门址，在城内中部发掘了一处大型宫殿遗址（30号台基），此宫殿遗址的东部又探出了一部分小城城垣。根据这些发掘，了解到大城城垣属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30号台基也是筑于战国时期，从而表明纪南城是战国时期的楚郢都^[33]。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文献记

载的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由丹阳迁都的郢是否在此？楚国更早的都城丹阳又在何处？1979年，俞先生带领我们发掘当阳季家湖古城，也是带着这些问题进行的。但发掘的结果证实，此城不是西周时期的，只是比纪南城略早些。在古城的中部偏东北处，也即我们发掘的台基处，农民曾经挖出一个较大的铜构件，曲尺形，中空，外壁四面皆饰粗壮的回形纹，并用棘刺纹作地，用细龙纹或三角蟠虺纹作边，具有明显的春秋风格^[34]。与青铜构件同出的还有一件铜钟，其上有铭文，钲部四字“秦王卑命”，左鼓部八字“競坪王之定救秦戎”，该钟铭文不全，应是一套编钟中的一件，据铭文和形制看，此钟也似为春秋时期之物^[35]。另外，在古城以西2.5公里处的青山之地，出土一件铜壶的圈足，饰垂鳞纹，是春秋时期的典型铜器，应出自大贵族墓中。这一切迹象表明，季家湖古城应是春秋时期的一座重要楚城，这也是当时正式考古发掘而确认的唯一一座早于纪南城的楚城址，以至有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城可能是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由丹阳迁至的春秋时期郢都^[36]。当然，这次对此城的发掘和认识只是初步的，以后有机会还应继续做工作，弄清其范围、布局及更确切的时代和性质等。值得庆幸的是，2007年崇源国际（澳门）拍卖公司征集到的一批青铜器^[37]，可能会对判断季家湖古城的时代和性质有帮助。这批青铜器共28件，计君鼎6件、君簋6件、竞之定簋2件、竞之定鬲7件、竞之定豆2件、楚王恽盘1件、楚王恽匜1件、龙耳方壶2件、提链浴缶1件，应是同坑出土的成套楚器。有21件铸有铭文，其中11件为竞之定作器。竞之定器铭文为：“唯武王命竞之定救秦戎，大有功于洛之戎，用作尊彝。”吴镇烽先生根据同出君器、楚王器并结合《左传》所载楚伐伊洛诸戎之记载，认为竞之定器铭文的大意是：“某年二月，楚王命令竞之定援救秦戎，这对洛河流域的少数部族是有很大功劳的，因而铸造祭祀用的礼器。”竞之定是“握有兵权，有着自己领地（封邑）的一位有权势的封君”，楚王禽恽可能是楚平王熊居^[38]。李学勤先生对“竞之定”铜器铭文和当阳季家湖所出甬钟铭文进行考证认为，“竞之定”即“景之定”，也即“景平王之定”，与楚昭王是兄弟，均是楚平王之子^[39]。从这组铜器的纹饰和形态看，其时代属春秋晚期之器，两位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并且也可以肯定，“竞之定”或“竞坪王之定”乃一人之名称，是楚国的一位王室贵族。季家湖古城所出甬钟铭文所记内容也同样是楚王命竞之定救秦戎之事，与其同出的铜构件应是悬挂编钟的木质钟架之构件。这种记录竞之定功绩的青铜重器出在古城建筑基址范围之内，是否也可以证实，季家湖古城属于春秋晚期，不会是楚文王时所迁郢都，有没有可能是楚封君竞之定之封邑，还可再研究。

不仅从考古发掘证实纪南城、季家湖古城不可能是春秋时期的郢都，而且从楚昭王时期楚与吴的战争也可证实此两座城不可能是春秋时期的郢都。《史记·楚世家》载：昭王“十年冬，吴王阖闾、伍子胥、伯嚭与唐、蔡俱伐楚，楚大败，吴兵遂入郢。……昭王亡也至云梦。……十二年，吴复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鄢。”《正义》注引《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东北三十二里，在故都城东五里，即楚国故昭王徙都都城也。”所注楚昭王故城在襄州乐乡县可能是对的，但为避吴军迁至相距只有五里的都城又有何用？《史记》所记楚吴之战事件，史

料来源应是《左传》，后来研究者对此事件进行了说明。如明傅逊《春秋左传属事》记：“楚郢本今江陵，吴自江而至颇为便，易襄阳稍北，吴既难犯，尤居国上流，其势易以制吴。”清朱鹤龄《读左日钞》也同意傅逊的解释。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记：“定六年，楚避吴北去，徙都郢，仍名郢，谓之鄢郢。《左传》所谓迁郢于都是也，因名江陵旧都为纪郢。”然查阅《左传》所记昭王时期楚吴这两次战争的经过可以看出，明清学者将昭王时期的郢都定在江陵纪南城是错误的。《左传·定公四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左司马戌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必大败之。’”结果还是楚大败，吴五战而攻入郢都，“楚子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后又逃到鄢、随。此后楚国凭借秦国援助击退吴兵，昭王才返回郢都。后两年，吴再次攻楚。《左传·定公六年》：“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番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于是乎迁郢于郢。”《左传》明确记载，吴军攻楚并不是由长江而上，而是由淮河西进，再由淮河上游往南攻楚之郢都。假如此时期的郢都在江陵纪南城，有些事件就不好理解。如吴军第一次攻入郢都，昭王向西逃至“睢”，即今当阳、枝江的沮漳河一带，这可以理解。后又“涉睢济江，入于云中”，“云中”即云梦泽，在纪南城之东，昭王何必由纪南城之西偷越吴占领区而逃到云梦泽，这是不好合理解释的。再者，吴军是由淮河上游向南进攻楚的，假如此时的都城在江陵纪南城，楚惧怕吴再次攻郢都，乃北迁都郢，“谓之鄢郢”，既然昭王惧怕吴军再次攻郢而逃亡，又为何迎吴进军之锋而逃至鄢郢，这不是自取灭亡之举吗？由《左传》所记述的这两次楚吴战争来看，春秋时期的郢都肯定不会在江陵纪南城或当阳季家湖古城。

春秋时期的楚郢都在何处，清华简《楚居》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楚居》记载，西周前期熊绎至熊渠所居夷屯近“郢”，后又经数迁，至西周末年熊仪徙居郢，之后的蚡冒自郢徙居樊，宵敖自樊徙居宵；武王自宵徙居免，并将其扩建，称为疆郢；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又徙居燹郢、为郢，又复徙居免郢，并改名曰福丘；至庄敖由免郢福丘迁居都郢。这是西周前期至春秋初期，楚王居地的迁徙路线，这些居地究竟在何处，我们还是从比较明确的“郢”地来分析。西周前期熊绎至熊渠所居夷屯近“郢”，西周末年若敖熊仪徙居“郢”，春秋时期庄敖由免郢迁居“都郢”，此三个时期“郢”的地望，是解开楚人迁徙路线的关键。《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秋，秦、晋伐郢，楚斗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师成商密。秦人过析隈，入而系舆人以围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书，伪与子仪、子边盟者。商密人惧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师。秦师囚申公子仪、息公子边以归。”晋杜预注：“郢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都县。”又注：“商密，郢别邑，今南乡丹水县。”孔颖达疏：“言本在商密者，据在后移都，称旧都以为本耳。”郢旧都本在商密，即汉晋时期的南乡丹水县，亦即今河南淅川县境，其后迁于南郡都县。徐少华先生根据新发现的“郢”青铜器铭文，对郢国历史地理作了深入研究，认为西周中

晚期，都可分为上郡和下郡，均在丹江支流淅川流域（认为上郡在今西峡县境，下郡在今淅川县境），至鲁文公五年（公元前622年）秦再次入都后才南迁至今湖北钟祥县境^[40]。徐少华先生以新出土的铜器铭文资料印证了杜预注“都本在商密”之说是正确的。《楚居》所载三个时期的“都”地也证明了杜预注是正确的，熊绎时所称的“都人”即都国之人，说明西周时期商密之都国的存在；西周末春秋初“若敖熊仪徙居都”，说明此时都国已被驱赶出商密，商密之“都”成为熊仪所都之地。春秋早期的宵敖徙居“宵”，根据湖南里耶秦简所记^[41]，宵地应在湖北荆门以北、宜城之南地域，说明春秋早期楚已进入今襄宜地区。文王之子庄敖由免郢迁居的“都郢”也应在这—地区，正是杜预所说的都由商密迁于南郡都县之地。那么，宵敖居“宵”和庄敖居“都郢”之间的武王、文王数迁之诸“郢”也应在这—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襄宜平原春秋时期的楚文化遗存非常丰富，由此可推测，楚武王、文王所迁的郢都应在襄宜平原区域内。

将春秋时期的楚郢都确定在襄宜平原，《左传》所记载的昭王时期楚吴两次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昭王十年，吴军由淮河上游第一次攻入郢都，昭王向南逃至沮漳河一带，季家湖古城正在此地，并且此城有可能是景之定之封邑，景之定是楚平王之子，与楚昭王是兄弟，昭王正是奔其兄弟景之定而来。后又转经云梦泽至郢和随，郢、随都是楚之同盟国，郢、随果然救了昭王之性命。昭王十二年，吴再次攻楚，楚昭王去郢，北徙都都。此都应是商密之都。因上一次吴攻入郢都，是秦国援助击败吴军，解救了楚国之困，商密之都近秦，大概昭王还是想借秦军以御吴军，所以北迁商密之都以近秦。

西周时期，楚所居丹阳地望也可从《楚居》记载来推定。西周成王时期的熊绎使都啗占卜选择夷屯居住，并在夷屯先构筑便室即宗庙进行祭祀^[42]，这说明夷屯对楚来讲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地点。《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礼记·曲礼下》载：“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墨子·明鬼下》载：“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因熊绎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所建之都首先要筑宗庙，这正说明夷屯是楚正式封国建都之地，是楚国的第一座都城。从熊绎使都啗占卜都邑位置、宗庙建成后又窃都人之牛以祭来看，夷屯的具体位置应与都地邻近。西周时期的都国既然在丹江支流淅川流域的商密，熊绎所居夷屯大概就在都国地域之西的丹江流域。如此可知，《史记·楚世家》说熊绎居丹阳应是泛指，而《楚居》记熊绎徙夷屯则是实录，从大的范围来讲，都属于丹江流域。这样，长期以来有关楚居丹阳问题的论争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丹阳不是具体指城址，而是泛指丹水之阳，是早期楚人主要的活动生息区域，夷屯才是熊绎正式受封建国的第一座都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新一轮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促使了楚文化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涉及楚文化的方方面面，涌现出大批新成果。每当目睹楚文化考古的新发现、新成就，拜读一篇篇、一部部楚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就情不自禁地想

起掀起新一轮楚文化研究热潮的所有先生们，是他们为楚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开阔了思路，创造了条件。岁月如流，虽已过去30多年了，但这些先生们的突出贡献还历历在目，难以忘却，久久怀念。回顾往事，感念万千，谨著此文，以志纪念。

注 释

- [1]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
- [3]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 [4]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 [5]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 [6]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江陵太晖观楚墓清理简报》，《考古》1973年第6期。
- [7]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湖北省江陵出土虎座鸟架鼓两座楚墓的清理简报》，《文物》1964年第9期。
- [8] 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县文物工作组：《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第3期。
- [9]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雨台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84年。
- [10]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与发掘》（上、下），《考古学报》1982年第3、4期。
- [11] 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季家湖楚城址》，《文物》1980年第10期。
- [12] 湖北省博物馆：《沮、漳河中游考古调查》，《江汉考古》1982年第2期。
- [13] 湖北省博物馆：《当阳冯山、杨木岗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 [14] 宜昌地区博物馆：《当阳磨盘山西周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
- [15] 俞伟超：《先秦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
- [16] 高崇文：《从夏商时期江汉两大文化因素的源流谈楚文化的起源》，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上、下），文物出版社，2001年。
- [18] 荆州地区博物馆等：《湖北江陵荆南寺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8期。
- [19] 沙市市博物馆：《湖北沙市周梁玉桥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朱家台》，《考古学报》1989年第1期。
- [21]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襄樊真武山周代遗址》，载《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5年。
- [22]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湖北宜城郭家岗遗址发掘》，《考古学报》1997年第4